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中国化

——兼论上海市郊农民百年奋斗历程与新征程

张占耕

摘要：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问题和切入点。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奋斗的百年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实践中发现中国农民隐藏着极大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革命性，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组织和引导农民寻找符合国情的、解放自己和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党领导下的以工农同盟为基础、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农民革命。中国农业合作化是党领导下由农民选择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模式，农民是中国农业合作社化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中国农业与工业同行发展，走的是从“以农促工”到“以工促农”、再到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的道路，中国农民既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大地落地、开花、结果，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乡土味，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最宝贵的经验和传统，在现代农业与农村建设的新征程中必须继承与发扬。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农民问题 建党百年 上海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农民、农业和农村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产业，农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的环境。讨论农民问题，不能不同时讨论农业和农村，这就是国内将农民、农业和农村概括为“三农”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此类问题一般被统称为农民问题，如《法德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等。这是农民处于“三农”中心地位的缘故。农民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由农民问题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农民的重要性在于“农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农民所从事的农业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以及“一切社会的基础”^①。

回顾与总结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百年历史，更主要的目的是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希望于新征程中中国乡村振兴取得更辉煌的成绩，继续使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理论发扬光大。本文研究除了主要涉及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领域外，还将涉及与此相关的工业产业、城市区域以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同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者，他们不仅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指导和纲领制定，还参与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各种实际斗争。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产生于马克思、恩格斯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实践之中。毕竟马恩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当时尚未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实例，因此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更多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只有期待革命成功后的各国通过与自己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浴血奋斗做出了世人瞩目的伟大业绩，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成果。

（一）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马克思不仅对欧洲农民而且对东方农民都做过考察，恩格斯则对法国和瑞士的农民做过 40 多天的深入调查。他们的最终结论是农民具有革命性，无产阶级革命若要取得成功必须与农民联盟。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从 19 世纪的巴黎公社到 20 世纪的苏联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都是工人。尔后，中国湘西、海陆丰等一系列农民暴动，使千百万农民大众以排山倒海之势登上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舞台。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在国民党的严厉监控和残酷镇压下，农民运动同样如火如荼，如 1926 年毛泽东同志在《向导》周报撰稿热情赞扬的崇明西沙农民暴动，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小蒸暴动，以及枫泾、奉贤庄行等地的农民暴动。

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不同，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武装暴动，建立根据地，使星星之火燃遍全国。井冈山、闽西、鄂豫皖、川陕、鄂西、琼崖等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大革命时期，上海市川沙县也曾建立过自己的县级红色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建立了大量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武工队，以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青纱战使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上海市郊由张爱萍等新四军领导组织郊区抗日武装，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以及崇明抗日游击区。其中，青东抗日游击队发动了近百次对日战斗；浦东支队从 12 人的短枪队发展为几百人的长枪队；淞沪支队由弱到强，控制了上海浦东和浦西的广大农村，为我党在这个地区的抗日总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老区“父母送子，妻子送夫”，竞相上战场，老乡推着小车为解放军运军粮。在“固若金汤”的上海郊区也活跃着农民武装，浦东等地的农民恢复了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民众的主体正是农民。

^①袁念琪：《曾记否，浦东那一支平原游击队》，<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7/0817/c85037-29477285.html>。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不仅增强了对党极大的信任感，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规模土改积累了宝贵经验。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土改运动，一开始便立刻疾风暴雨式地席卷全国。鉴于对农民的高度信任，中国不是采取苏联的土地国有化，而是直接把土地分到贫苦的农民手里。在短短的2~3年内，土地革命即告胜利。上海市郊土改仅一年完成，70%以上的农民分得土地^①。

历史充分证明：党领导下的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战士和功臣。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同盟为基础的农民革命。

（二）农民是中国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者

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考虑，马恩认为，改变落后的小农经济必须采取农业合作化。1844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经济组织就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但是马恩主张的合作社是消灭剥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马恩所主张的农业合作社，先后在苏联和中国实现。除了具体名称不同，它们都是一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基石，但是苏联和中国的实现路径与具体模式不完全一样。

中国农业合作化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自觉的正确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化没有苏联的强迫性以及由此而引起大批农民退社的现象，而是通过引领、示范，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觉参加、自愿选择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是“集体农庄+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的土地与拖拉机站都是国有的，集体农庄缺少自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是几乎凋敝的传统农业国，只能选择“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中国合作社的土地所有权为区域农民集体所有，经营权也属于合作社，因而合作社有较大的自主权，为农民广泛欢迎。因此，农业合作化一开始便如暴风骤雨般席卷全国。在掀起合作化高潮的1956年，6月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年底就达到了87.8%^③。为了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合作社的具体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与完善。此期间曾有过“一大二公”不断扩大规模的错误尝试，更有改革开放后以小岗村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创举——创造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即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集体和家庭双层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模式适应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当时的农业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粮食总产量在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前的1978年为6095亿斤，在推广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1984年达到了8146亿斤，增长了34.3%（陈锡文，2018）。上海并没有因为农业生产条件好而在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步伐上落伍。上海市郊嘉定区在1979年就有农民率先实行饲养

^①《上海通志》（第二十二卷：农业），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idnode=79465&tableName=userobject1a&id=103757。

^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2页。

^③陈伯庚、陈承明、沈开艳（主编），20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承包责任制，1980年在嘉定区朱家村生产队实行责任到劳联产计酬的承包方式（罗大明，2014）。到1983年5月，上海市郊有95.4%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逢树春，2014）。

为了更好地实现集体经济与市场的对接，有利于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实现农民非农化转移，中国农村又推行了三权分置，为农业资产的跨区域流动、超越一家一户范围的配置以及为组建专业合作社、农业（股份）公司的资产重组提供了市场依据。三权分置又推动了农村集体经营模式适应规模化的新变化。上海市松江区采取在村内竞标并委托中标的本村农民承包全村耕地的经营方式，是一种既实现经营规模化又坚持集体经营的新模式。2018年，上海市郊承包地流转比例约占54%（李梅玲等，2021），通过土地流转促进了土地经营规模化。2020年，上海市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的水稻总种植面积占全市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①。

从合作化到家庭承包制、再到三权分置，都来自农村实践。中国的合作化运动起源于山西省平顺县，农民李顺达、王国藩是组织者和领头人。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出现在安徽省小岗村。三权分置也是中央在总结了各地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合作化运动到农村集体经营方式的各种改革，都是党领导中国农民对符合国情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探索。应当说，农民是建设中国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践者和探索者。

（三）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农业合作化后，如何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又如何国民经济中体现自己的价值？马克思考察了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提出农业参照工业化的发展方向，用工业技术装备以及社会化、专业化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改造和武装落后的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

但是，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如何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农业发展不仅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而且也不能走苏联的道路。当时苏联虽然落后于发达的英法美等国，但毕竟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集体农庄建立后不久，苏联立刻通过进口和生产大量拖拉机支援农业。中国当初“一穷二白”，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同时，农业资源相对贫乏，老祖宗留给下的农业机会成本极高，长期以来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中国当时只能走一条极其艰辛的道路——既要解决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又要“以农促工”为实现工业化提供支援。没有大工业支持，中国农民只能以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精神，顶烈日，冒风雨，手抬肩挑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创造了许多令世人震惊的奇迹，从而解决了千百年来不能解决的温饱难题。现在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已经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逐步进入农产品丰富多样的基本小康阶段。中国农民又是工业化资金的积累者。1952—1978年，中国通过农业积累的资金与当时国家规模以上固定资产原值大体相当。就是说，当时中国工业基础的形成基本上来源于农民提供的资金积累。而农民又是中国工业化的直接建设者。1986年，全国乡村企业创造了3300亿元的产值，占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1.7%，乡村企业吸收的农村劳动力达到7600万人（沈关宝、李友梅，1988）。由于大量农民非农化，上海市郊农村的产业结构到20世纪90年代转换成“二

^① 《上海通过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条例 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占全市一半》，<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20-11-27/doc-iiznezxs4062052.shtml>。

三一”，非农务工成为市郊农民的主要就业空间。

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又支持农业。2019年，中国“畜力加人力”和“靠天吃饭”的落后面目已被改造。上海市在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正在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和设施蔬菜栽培的自动化，大数据、区块化、智能化技术也开始渗透农业。

（四）工业反哺农业，进入新农村建设阶段

工业化后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及的新情况。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农业为基础的理论，为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的战略部署。

20世纪末中国工业化经历了艰苦创业后，终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从而迎来了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的时机。1987年的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只有195.72亿元，1998年上了1000亿元台阶（左锋、曹明宏，2005），到2005年上了3000亿元台阶^①。工业化后对农业的反哺为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规律，但是中国的工业反哺农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一是发达国家反哺农业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的资本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向利润率较高的农村。而中国的反哺纯粹是为了建设新农村。二是中国反哺时的经济实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远不及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中国在2000年实施反哺农业时的人均GDP只有当时日本和韩国实施反哺时的22%和23%，城市化率只有日本和韩国实施反哺时的56.7%和62.9%（马晓河等，2006），中国真心实意为农的初心可见一斑。

与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反哺农业是全方位的，重点是农业且包括整个农村。在农业方面，有针对农业处于弱势地位和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补贴；在农村方面，有农村自然环境治理和乡村基础建设与改善村落宜居环境的补贴；在农民方面，有教育文化等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以及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投入。同时，反哺农村在东西部有不同的侧重点：西部贫困地区的重点是脱贫，实现近亿农民脱贫；东部发达地区把重点放在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上。例如，上海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和设施农业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上海市郊在市政建设上与城区相同，郊区与城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不存在本质区别。

工业反哺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保证。2004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国进入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其前提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后财政大规模投入农村。应该说新农村建设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

二、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参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具有了中国的特点和乡土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

（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①《解读：去年中央支农3000亿元花在哪里了？》，<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7/11198382066s.shtml>。

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人类解放的学说。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柱，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和归宿。有些学者混淆了马克思对农民与小农生产的不同态度。其实马克思只是对农民从属的小农生产方式予以否定。农民作为从事人类不可缺少的食物生产者以及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劳动者，毫无疑问正是马克思解放全人类不可忽视的对象。马克思对于剥削制度下处于悲惨境地的农民更是抱有极大的同情。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是一种“用血和火”的惨绝人寰的方式铸成的。资本主义农场中的农民，不仅要承受雇佣他们的那些农业资本家的剥削，还要承受处于生产经营之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较之城市里的工人，他们的生活状况更悲惨、更糟糕。而东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深受高利贷者和地主等的多重压迫和剥削，生活极其贫困，甚至濒临破产。例如，印度农民在殖民时期遭受各种各样的制度缺陷所带来的苦难，像农奴一般劳动，却生活得还不如农奴。马克思在 1842 年发表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在 1843 年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最早关注农民问题的文章。正是这些反映农民悲惨命运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从纯政治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研究，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加速转向唯物主义。

1949 年之前，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处于更为凄惨的境地。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交完地租之后，所存无几，存在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首位的重要大事。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入农村调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定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邓小平同志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成为邓小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2015 年，习近平同志在农村考察时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③。

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到合作化、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再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解放农民，为农民谋利益，让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一条鲜明的红线。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首先落实到了中国农民身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二）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革命与建设的主体和主力

马克思、恩格斯处于工人阶级占多数的被称为“世界城市”的欧洲，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处于悲惨境地的工人阶级。随着革命的发展以及对于农村、农民的深入考察，他们对于农民革命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马克思认为，分散、孤立和封闭的生产方式，使小农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认为农民并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1 页。

^② 《邓小平如何处理农民问题》，<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417/c69113-31677856.html>。

^③ 《习近平：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19/c70731-27325093.html>。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5 页。

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工人阶级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处于孤立无援的事实改变了马恩对农民的看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1852年的初版中，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首次提出，要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必须由农民参加，而且必须处于工人阶级同盟军的重要地位^②。

至于如何评价农业国家中农民的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东方农民问题后明确提出，处于东方的印度、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东方农民深受多重压迫和剥削，参加革命斗争的意志坚决，已经成为一种革命力量。

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业大国离开广大农民而只是依靠10%不到的工人能否获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之源在哪里？

当时欧洲处于工业革命时期，大量贫困和无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在英国工业革命后的1861年只占18.7%（石景云，1999）。而留在农村中的自耕农和富农比例不小，富足、殷实的生活使他们不愿改变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其中70%以上的农民为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他们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悲惨程度甚于欧洲农民，具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在20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于农民内部各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革命态度做了分析，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告知全党，中国农民隐藏着极大的改变自己长期遭受苦难的革命意愿，具有强烈的反抗和革命性。中国农民的解放必须而且完全可以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农民自己。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不同于欧洲的且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中国农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大多数来自优秀的农民，中国工农武装大多数来自有觉悟的农民，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民集聚的农村，中国革命的本质是中国农民的革命。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亦是如此。无论土改、合作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探索与实践，还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觉悟了的农民自觉参与革命与建设，正是解放了的农民其意志和行为的自由表达。中国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体现了中国农民全面解放自己的最生动和最真实的典范。

（三）农民自觉参与和探索是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特点

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具体有两条。一是小农经济方式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小农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小农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小农生产是自给性的，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小农经济方式“限制着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农民被死死地束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在这些小块土地的农业劳动中，既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无偿自然力”（曾芬钰，2004）。二是由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效率极其低下，小农常常不足以养活自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组织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中间环节的农业合作社。他们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设想是：其一，国家具有土地所有权，将土地使用权授予农业合作社经营；其二，扩大农业规模与联合劳动，以适应农业的机械化。鉴于农民长期处于封闭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保守务实的特点，因此合作化必须采取自愿和示范方式，切忌强迫。对于合作社的具体经营模式，马恩只是主张采取集体劳动，即需要“按工业方式经营”^②，并没有更具体地论述。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走了一条由广大农民自觉参与组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丰富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理论。

第一，苏联集体农庄主要接受政府机关的直接安排。国营拖拉机站是政府监管农庄的机构，农庄基本没有自主经营权。与当初马恩的设想和苏联的做法不同，中国采取土地区域农民集体所有，主要生产资料也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还留有自留地。农业合作社具有较高的独立自主的经营管理权。虽然也曾存在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但长期以来坚持以村级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55年，毛主席对上海市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按语中提及农业合作社“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③。显然，毛主席把农业合作社看作一种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

第二，农业合作社的具体经营模式也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合作社应该如大工业一样采取集体劳动，但究竟是何种具体的模式马恩对此没有论述。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民自己探索的基础上，提炼和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社具体模式。首先，确立了农业合作社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合作社具有通过市场使农产品和各种农业要素（包括对于三权分置中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产权化）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流通、配置和组合。这与市场具有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相一致，与马恩当初设想的合作社计划管理不同。其次，在农业合作社内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最大的特点是与小农经济之间存在形式上的某些相同之处：一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二是生产规模比较小。有人以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小农经济。这是错误的，因为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而言：第一，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农民只是凭成员资格获取长期但并不是永久的承包权；第二，家庭是主要经营者，但不是唯一的经营者，而是集体与家庭双层经营，集体仍然对合作社内的资源配置、农田建设和农业设施的建设管理、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的绿色安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3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7页。

^③ 《李子园村缘何位列全国模范村？》，<http://newsxmwb.xinmin.cn/shizheng/2020/10/24/31831672.html>。

以及其他集体经济具有经营管理权限；第三，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排除专业分工与机械化，同样享受耕地、收割、植保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带来的益处；第四，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生产规模具有弹性空间，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和非农化发展的进程，通过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有偿流转可以逐渐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农业合作化在形式上具有小农经济的某些特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农业合作化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许多农民还将维持较小的经营规模；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也有利于适应农民的传统心理，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小农意识的传统心理不可能一下子消灭殆尽，正如列宁所说的“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①。

（四）与工业化同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的国民经济基础理论、城乡融合理论与农业发展道路相关。对于农业集体化后农业如何发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论述，但他们的观点很明确，即发挥大工业这个“最革命的作用”，直接享受工业化成果，使“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运用”应用于农业，走以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和化肥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工业化的道路^②。弱势农业没有资金怎么办？马恩的答案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③。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不仅此路走不通，还必须挑起解决千百年来未曾解决的温饱问题以及为工业化起步提供资金的双重担子。既然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条件，那么就“以农促工”，以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当时毛主席就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靠工业化^④。于是农业与工业化并行发展的一条特殊道路就逐步形成了。工业化之初农民承受巨大牺牲，工业化实现一定规模后，“以农促工”转换成“以工促农”，工业化逐渐带动农业实现现代化。当工业有了更大的实力，终于实现大规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从而有力地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实现一体化，实现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

在中国农业与工业化同行的辩证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在中国工业化初期，粮食特别紧缺，工业规模又小，农业的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加粮食产量上。工业化有了一定规模后，除了增加粮食产量外，农业的基础作用又需要体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上，以便促进农民非农化。由此，中国农业形成了以土地生产率为基础，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路径。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5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④ 朱佳木：《毛泽东是中国工业化的伟大探求者》，<http://news.sina.com.cn/c/2003-12-31/17141475867s.shtml>。

三、马克思农民问题中国化的新征程

根据中央“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此相适应，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和农村。

（一）世代期盼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终将实现

现代化是一个时代性和世界性的概念。中国所要全面实现的农业现代化应是世界一流水准的农业现代化。曾经许多人提到农业现代化时，不自觉地以当今欧美发达国家为楷模。其实许多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模仿工业的现代化模式。当今农业现代化以美国为典型，但是美国的农业是石油农业，与农业依靠光合作用产生生物能的本质有所背离。

但是不能简单地否定工业技术设施装备武装农业，主张“去机械化”而回到“田园牧歌式”的农业中去。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必然是工业与生物领域中的科技有机结合。当今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予这种新型的农业现代化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可能。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正迎来技术革命的高潮。技术革命中的智能化、大数据技术层出不穷。农业生产分散，劳作辛苦，不确定因素多，最适宜采用智能化、大数据、区块化等信息技术。传统的农业机械化正转向农业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未来15~20年内，将掀起新一轮农业生物技术浪潮（王栋等，2018）。生物技术是农业发展的基础科技，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另一方面要用现代生物技术提升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院《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公示，2016年上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得分为全国之冠^①。可见，上海市具有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率先探索生态农业与智能农业有机结合，为既继承传统特点又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

（二）建设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又充满现代文明的美丽乡村

农民不仅是食物的唯一生产者，还是广阔国土的主要守护者。乡村的土地既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生活的环境场所，还是维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绿色屏障，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两山”理论的深刻意义。

首先，以更高的标准治理乡村的生态环境。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特点和农业不同功能的要求，并参考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确定地表水、土壤环境和空气质量指标，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落到实处。不然，无论是建设现代生态田园村落，还是种植高质量绿色农产品，都没有生态基础。

其次，实现田园村落现代化和生态化。农村与城市一样，具有必需的道路、电力、通讯、饮用水、废弃物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其中，村落还应具有和城市一样的现代

^①《中国农业科学院关于〈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的公示》，http://www.moa.gov.cn/xw/zxfb/201711/t20171117_5903945.htm。

化生活设施，以及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载体。而农村最美之处和最大的优势是自然生态环境，农村人既要与城里人一样享受现代居住条件，又能充分享受城里人没有的自然生态环境。

再次，留住乡村的文化之根。中国是千年文化古国，有许多历史文化的遗迹散落在广大乡村。村落的民风民俗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活化石”。要珍惜祖辈留下的文化遗产，通过乡村活动中心和农家乐等形式保留下来，让后人享受乡村文化的沐浴。

（三）成为素质高、生活富裕、职业选择自由的新农民

传统观念中，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思想保守，生活贫困，而且只能世代务农。新征程建设将使农民的精神面貌和职业形态焕然一新。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加之家庭承包权有偿退出和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政策的推行，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自由选择职业。随着政府对农村教育事业投入的增加，农村居民可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教育资源。长期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2~3倍的城乡收入差距必然改变。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到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水平，需要三管齐下。

首先是提高农业效益。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产出和减少成本是必由之路，但这不是唯一的路径。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要通过自然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但是，中国人均土地资源有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增长的幅度。因此，对农业效益的期望要适当。

其次是促使农民非农化。农业科技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之路，但破解中国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的瓶颈需要通过农民非农化和农业规模化来实现。以浙江省为例，2020年浙江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2.17%，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比已下降到1.68，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这充分说明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是促使剩余农民离开农业（魏后凯，2021）。

再次是把财政支农补贴作为长期国策。财政支农补贴包括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教育保障、粮食种植补贴、农业设施购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补贴。在中国，粮食在严格意义上是准公共产品，农村环境保护是公共资源的保护，而祖先留下较高的农业机会成本需要全体后人承担，因此，财政对于“三农”的转移支付同时体现了社会公平和代间公平。

（四）实现城乡、工农产业、农民与城镇人口的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发展趋势，高瞻远瞩地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的预见和设想，其中有马克思提出的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最高阶段的理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乡融合理想，期望可以在百年新征程中能够逐渐接近。

首先，城市与乡村逐步融合。一是城市现代文明融入乡村。农村要拥有与城市一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实现城乡均等化。二是农村生态文明融入城市。积极发展都市农业，让水泥森林式的城市沙漠被绿色覆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出判断：“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中国耕地稀缺，不应该提倡模仿西方盛行的森林都市。例如，上海市在近郊建设连片的郊外公园，在远郊建设五个新城，在规划时采取农业与城市板块镶嵌的布局，使绿色生态渗透到城市。上海未来可以成为现代田园式大都市，城区可以发展屋顶农场、市民农园、垂直农场，建设每层有花园的第四代建筑等。

其次，城乡产业融合。城乡产业融合最根本的是工业与农业的融合。马克思说：“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①可见，工农业的融合在整个城乡融合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与工业相比，农业缺少工业的机械化和专业分工，更主要的是无法有效控制动植物有生命的生产过程。鉴于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比以前的估计会超前。上海市在智能化温室、大数据智能灌溉等技术方面有一定基础，可以在实现工农产业融合发展中成为中国的标杆。

农业产业融合还有许多种类。可以是农业内部不同功能之间的融合，如种植业的生产与休闲业的观光旅游功能的融合。可以是农业产中与产前、产后不同生产过程的融合，如种养殖与种苗和种子培育之间的融合以及农业种植过程与加工流通过程的融合。可以是不同产业在同一个农村空间中的融合，如利用农舍、村落中的建设用地发展一些原来布局在城市中的无污染产业。也可以是上述这些融合之间的再融合，如农业种植业与加工业的融合，然后再与农业观光业之间的融合。如此等等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贵州省毕节农村利用当地木材生产小提琴出口欧洲，云南省剑川利用农舍客厅和天井发展当地民族木雕。上海市为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落地许多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但苦于缺少建设用地。可以尝试在乡村寻找空间，如上海奉贤区农村建设企业总部，华为在上海青浦区乡村建设研发中心。

再次，城乡人员融合。鼓励部分年轻人回乡从事乡村服务和手工工艺，以及从事现代农业。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建设民居、养老院和住宅群，吸引城里居民来村落居住。人员流动了，就业机会就多了。同时，城乡文化交流增多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

四、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继承与发扬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为全世界农民指出了实现解放走向富裕的方向，这也是他们对农民的殷切期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通过百年来的艰苦奋斗，终于将马恩的期盼变成现实。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还是走上合作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是马恩宝贵的思想和理论种子在遥远的东方结下的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在百年历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农村的新征程中继承和发扬。在新征程中，新发展、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会层出不穷。

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向毫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来自对人类社长期整体发展的认识，这些观点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必须坚守不放弃。百年历程中坚持过的一些核心观点，不能因为今后现实中的纷繁多变而动摇。如马克思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公有制的本质不能动摇。有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实施资产按份所有，但资产按份所有不符合公有制。可以有“一人一票”的决策权和“一股一份”的收益权，却不可以有按股所有的资产权。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如城乡融合理论，反映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过去由于条件不成熟，这些理论未曾提到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与加强城乡融合体制与政策的决定，标志着中国从城乡一体化迈入城乡融合的新阶段。为此，对于马恩城乡融合理论中关于工农产业融合、城乡布局融合、城乡居民融合、城乡生态融合等方面的许多具体设想和要求，需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逐步实现之。

另一方面，对于实现这些核心原理的具体形式和路径等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外，马克思主义还有许多外围观点。由于特定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的不同和变化，这些观点可以而且必须不断变化和调整。例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需要，农业集体经济的具体形式还会发生具体的变化。核心观点不能动摇，外围观点则可以根据客观条件灵活适应。

如何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百年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最忠诚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并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就是人类的发展方向，跟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无往不胜。二是要坚持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只是穿梭于书本、停格于历史之中不行，只是按照头脑中的理想王国依样画葫芦不行，只是去一些先行地区走马观花、照搬克隆不行，以外国为标杆把自己祖国改造成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更不行。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实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神书，正是来自实践的提升和总结。而来自实践的新要求、新问题和新素材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大地落地、开花、结果，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乡土味，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最宝贵的经验和传统。三是坚持不忘为农民谋福利的初心，组织农民共同参与为自己利益的革命和建设。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全人类的重点是为农民谋福利。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中国农村的最大实际就是农民——农民的劳动、生活和观念等的具体实际。不深入农民之中，不了解农民，就是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 1.陈锡文，2018：《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行政管理改革》第4期。
- 2.李梅玲、鲁博、武星彤、谈平，2021：《上海等12个省市农业经营规模化发展现状与启示》，《上海农村经济》第8期。
- 3.罗大明，2014：《我在封浜搞联产到劳责任制》，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口述上海——农村改革创新（1978-1992）》，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4.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2005：《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管理世界》第7期。
- 5.逢树春，2014：《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口述上海——农村改革创新（1978-1992）》，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6.沈关宝、李友梅, 1988: 《乡村企业的发展与城镇化》, 《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 7.石景云, 1999: 《论英国、法国工业化期间农业部门就业与产值比重的变化及其影响》, 《经济评论》第2期。
- 8.王栋、陈源泉、李道亮、朱万斌、谭伟明、杜太生、田见晖、康绍忠, 2018: 《农业领域若干颠覆性技术初探》, 《中国工程科学》第6期。
- 9.魏后凯, 2021: 《全面打造城乡协调发展的引领区》, 《人民日报》8月5日。
- 10.曾芬钰, 2004: 《马克思论农民与农民个体经济》, 《当代经济研究》第8期。
- 11.左锋、曹明宏, 2005: 《财政支农资金利用现状分析及政策选择》, 《新疆农垦经济》第10期。

(作者单位: 上海农业科学院)

(责任编辑: 黄 易)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easant Problem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Course and New Journey of Peasants in the Suburbs of Shanghai

ZHANG Zhan'geng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not only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easant problems, but also the entry poi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Over the past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hinese peasant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new force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entennial course of the CPC has proved that China'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s essentially a peasant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alli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with peasants as the main for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Marxism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China's reality, so that the Marxist theory of peasant problems has landed, bloomed and borne fruit in rural China.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tradition of CPC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nd must b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new course of China's modern agricultur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 Marxism; Peasant Problem; the Centennial of CPC; Shanghai